

當前中共的統戰策略

葉 伯 棠

從最近中共的外交活動來看，當今年四月美國總統雷根訪問中國大陸甫告結束，胡耀邦即立刻前往北韓訪問，接着在六月中共總理趙紫陽訪問西歐和北歐，中共副外長錢其琛又訪問蘇聯。幾乎在同時，中共「國防部長」張愛萍前往美國訪問。就在中共全力積極展開外交活動之際，中共却在台海地區製造緊張情勢，這證明中共的活動與台海地區的情勢有密切的關係。究竟當前中共外交活動的情形如何？其製造台海地區緊張情勢的目的為何？這是本文所要分析的重點。

壹

首先筆者必須加以說明的，中共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之一即是「利用矛盾」。由於毛澤東受到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影響，早已明瞭利用敵人的矛盾，達到打擊敵人的重要性。所謂「利用矛盾」，就是利用敵人的缺點，或內部分歧，來打擊敵人。中共領導人經常提醒幹部要「極仔細、極謹慎、極微妙地一方面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①以便達到孤立敵人和打擊敵人的目的。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在錯綜複雜的矛盾中，必有一個主要支配着。基於這種認識，我們知道，儘管中共外交活動頻繁，但有一個主要矛盾支配着，這個主要矛盾就是針對中華民國政府而發的。

在過去，從周恩來到鄧小平，中共領導人不止一次地表示「祇要中華民國政府存在一天，我們就不得安寧。」這確是真心話。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自由中國的基地存在與發展，呈現政治安定、社會繁榮與經濟進步的局面，恰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形成極為強烈的對照，使中共一切的宣傳

都變成謊言；特別是自由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繁榮、民主，與中國大陸的落後、貧窮和專制形成極強烈的對比。因此祇要中華民國政府繼續存在，就會暴露出中共的「中國式社會主義」一切的缺點與落後。鑒於這種情勢的發展，中共領導人必然運用一切手段設法消滅自由中國的存在。所以無論是中共的統戰也好，或是中共的對外活動，都離不開這個目標。過去中共是採取曲折迂迴的方式，現在則是採取針鋒相對的鬥爭，企圖消滅中國人民所希望存在的制度。中共統戰的策略，就是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打擊主要的敵人。當前中共在國際間，就是運用一切手段，達到進一步孤立中華民國的地位。鄧小平曾經公開地表示，中共將採取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不放棄以非和平的手段。換句話說，當中共以統戰手段無法解決時，最後不得已祇好採取戰爭的手段。唯中共對中華民國的統戰，是有階段性的。

遠在一九五〇年代，國際間存在着兩極體系（bipolar system）。當時美國採取圍堵的政策，美國認為東、西雙方鬥爭表現在四個地區，即南北韓、台海地區、南北越和東西德。這四個地區也就是當時的火藥庫。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中美友好同盟條約，中共認為解決「台灣問題」如果沒有蘇聯的協助，是不可能的。故一九五八年秋，毛澤東經過周密的部署與策劃，利用中東伊拉克克變，製造台海危機，當時美國政府認為，中共利用中東危機，對於台海地區採取軍事行動，這不是中共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對抗，而是共產集團向自由世界的挑戰，艾森豪政府遂決定支持中華民國國軍對抗中共的軍事侵略。②由於我國國軍

英勇地還擊，加上蘇聯不支持中共的冒險行動，使中共遭受嚴重地挫敗。

經過台海危機失敗的教訓，使得毛澤東深切地瞭解到解決「台灣問題」，決不可能依賴蘇聯。如果中共與蘇聯緊密地結合，美國必然更加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理由是由美國政府圍堵政策的起草人肯南（George F. Kennan）因為受到地緣政治和環境理論（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theories）的影響，認為共產集團控制世界「心臟地帶」，美國必須結合西歐與大陸邊緣地帶的國家，共同對抗共產集團的擴張。③這是美國在戰後實施圍堵政策的主要精神。尤其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台灣，位於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也是太平洋與亞洲大陸的接觸地帶，控制着台灣海峽，在亞洲實處於樞紐的地位，基於戰略上的利益，美國政府認為中共對台灣地區的軍事行動，實為共產集團向自由世界的挑戰。美國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不僅表示美國政府對條約義務的承諾，也是圍堵政策一次重大考驗。基於這些理由，美國政府採取劍及履及的行動，在台海危機期間，支持國軍對抗共軍的挑戰。

貳

由於這一次的教訓，毛澤東深深地感到中共的統戰在國際間以拉攏蘇聯為目標，無法達到解決「台灣問題」的目的。於是設法脫離共產集團，企圖把解決「台灣問題」由兩集團之間的鬥爭轉變為國內問題。也基於這一原因，自一九六〇年開始，毛澤東設法採取反蘇行動，設法疏離蘇聯的關係，他採取的是相當曲折微妙、相反相成的策略；一方面批評蘇聯的和平共處政策，提出兩條路線鬥爭；一方面又強調武裝鬥爭路線，在第三世界提倡民族革命鬥爭，導致與蘇聯關係嚴重的惡化。

中共與蘇聯關係的惡化，從表面上來看，是雙方在意識形態的爭論，雙方對美國鬥爭策略的歧見，以及雙方在第三世界的路線的衝突。然而我們仔細分析中共反蘇的言論，毛澤東的反蘇的作法可以說是「不擇手段」，結果引起中共內部各種不同的意見，劉少奇就不同意毛澤東的這種作法。也許劉少奇不瞭解毛澤東心中的策略，也許劉少奇認為毛澤東做得太過份。但毛澤東看法不一樣，如果中共繼續與蘇聯結合在一起，「台灣問題」將

永遠不能解決。可能基於這種認知上的差異，導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清算劉少奇潛隱的原因之一。待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毛澤東就立即製造珍寶島事件，導致中共與蘇聯武裝部隊在中蘇邊境地區的衝突。這件事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產生深遠的影響，在此以前，美國鑒於中共支持北越對抗美國，對於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多少保留存疑的態度，現在中共與蘇聯雙方居然發生武裝衝突，美國不得不徹底檢討此一事件的背景及對今後情勢的影響，受到喬治肯南環境理論影響的美國決策者，認為如果蘇聯的科技和中共的人力與資源相結合的共產集團，對外實行侵略，必然對自由世界形成嚴重的威脅。④美國應設法運用可能的手段，阻止雙方的結合。⑤

基於這種觀點，尼克森總統時期擔任白宮安全委員會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遂提出拉攏中共對抗蘇聯的主張。⑥並且利用中共與蘇聯的歧見，趁機解決越戰問題，使美軍光榮退出越南戰場。如果越戰問題一旦獲得解決，對於尼克森的連任問題幫助甚大，也許可能基於這種考慮，遂導致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訪問北平與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並發表上海公報。

上海公報的發表是中共統戰重要階段。從中共對中華民國採取國際迂迴統戰方式而言，自從一九六〇年中共開始反蘇，到上海公報的發表，中共幾乎花了十二年的時間才獲得統戰的初步成果。但如從一九四九年十月共軍登陸金門古寧頭失敗算起，同年十二月毛澤東親自前往莫斯科要求斯大林協助中共「解放台灣」，至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雙方簽訂「中（共）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是中共國際統一戰線的第一階段。一九五八年中共製造台海危機失敗，到發表上海公報為止，共約十四年之久，由此可見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持久性與一貫性。中共經過大迂迴，由反美轉變到反蘇，透過反蘇的策略，直接與中華民國最密切的友邦建立高階層外交接觸，初步達到孤立中華民國的目的，這是中共統戰的第二階段。

如果仔細分析上海公報的內容，其中互相衝突之處甚多，但有兩項明顯的共同點：一、雙方都希望關係正常化，符合雙方的「國家利益」。二、雙方在反對霸權問題上，取得一致的立場。⑦明瞭中共策略的人都知道，中共統戰策略之一就是尋找「共同點」。所謂尋找「共同點」，就是指

中共爲了與其敵人接近或暫時的妥協，往往提出某些口號，作爲建立某種關係的基礎。現在中共爲了孤立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關係，虛情假意地以反對霸權主義作爲雙方建立暫時同盟的基礎，自此以後，中共提出「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口號，來孤立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叁

「上海公報」祇不過是中共孤立我國政府的開端，但距離中共所企求的解決「台灣問題」仍有一段遙遠的途徑。美國政府鑒於全球戰略關係，以及國內的輿論尚未形成，發展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時機尚未成熟，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美國總統福特提出太平洋主義，其中一項目標就是承認中共政權。但對中共來說，與美國建交情勢尚未成熟，祇有進一步製造形勢，以取得與美國關係進一步的發展。中共所採取的策略，仍然以反蘇的姿態作爲進一步接近美國的手段。基於策略上的需要，一九七〇年代，中共以反蘇急先鋒自居。中共反蘇外交政策影響最大的應算是一九七六年安哥拉獨立運動引起的內戰。當時中共和美國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組織（National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和「安哥拉獨立民族聯盟」組織（National Front for Total Independence for Angola）與蘇聯所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組織（Popular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爲了爭奪領導權，爆發內戰。蘇聯透過古巴政府，對於「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組織，實施大規模的軍事援助，而擊敗其他兩派組織。使美國在非洲的政策受到重大的挫敗，而與拉攏中共的念頭。

安哥拉內戰的結束，除了證明蘇聯的勢力已經延伸到南部非洲外，也顯示中共與蘇聯在非洲競爭勢力範圍遭受重大的挫敗。蘇聯勢力控制安哥拉，使美國維持全球均勢的戰略也同樣受到極大的打擊。美國本身沒有力量挽回頹勢，遂鼓勵中共與蘇聯在非洲地區繼續對抗。對於受到挫敗的中共而言，它在各種場合皆破口大罵蘇聯。中共「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時指責，「蘇聯在安哥拉是暴露蘇聯窮兇惡極的社會主義面目」。^⑧接着該報又說：「控制和干涉安哥拉，只是蘇聯進一步分裂和控制整個非洲的序幕

」。^⑨蘇聯這種行動，也是「扼殺民族解放運動的罪魁禍首，正是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⑩

罵歸罵，中共的謾罵並不能挽回它在非洲的挫敗。但是中共到處謾罵蘇聯在安哥拉擴張勢力，使美國有獲得知音之感，誤認爲中共與美國雙方在安哥拉共同利用，這是促成卡特政府白宮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提出拉攏中共對抗蘇聯的構想，在卡特政府時期，他的主張最爲積極，並且提出「玩中共牌」的主張，利用他參與美國外交政策的制訂，積極推動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發展。他說：「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是新政府一項主要戰略目標。我們相信，華府與北平之間的真誠的合作，將會大大地提高遠東的穩定。更廣泛地這種合作對美國在與蘇聯全球性的競爭居於有利地位」。^⑪這是布里辛斯基的「玩中共牌」的主要理由，但是這種理論尚待國際情勢互相配合。

一九七七年——七八年，非洲角爆發戰爭，一向支持索馬利蘭的蘇聯爲了非洲角和印度洋的戰略利益，突然轉變立場支持衣索匹亞對抗索馬利蘭。捲入非洲角之戰，震驚了卡特政府和美國學術界，咸認爲蘇聯如此肆無忌憚地對外擴張行動，不僅非洲地區可能落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並且使全球均勢遭到破壞，對美國極爲不利，美國在無能爲力的情況之下，唯有寄望於中共共同阻止蘇聯的擴張，事後證明這種政策是錯誤的。

肆

但美國這種錯誤的構想，給予中共勒索的機會，中共要求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作爲先決條件，結果造成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卡特政府承認中共政權，與我國斷絕外交關係，這是中共鼓吹「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收穫。事實上中共並沒有能力阻止蘇聯在非洲擴張，但對我國却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因爲中共的反蘇姿態並沒有破壞蘇聯在非洲的影響力，也沒有與蘇聯發生重大的衝突，祇是在口頭上嘍嘍，却引起卡特政府的幻想，尤其是以反蘇著稱的布里辛斯基積極在幕後推動，終於促成美國與中共的建交。

卡特政府不顧中美雙方長期的友誼，居然與一個在意識形態上敵視的中共政權建立外交關係，引起美國國會的不滿。針對這種情勢，卡特政府

乃提出與中共「平行戰略的利益」的口號。事實上，這完全是一個空洞的口號，美國與中共究竟有什麼平行戰略利益可言？中共既沒有力量對抗蘇聯，也不能阻止蘇聯在亞太地區的擴張。反之，由於美國接近中共，更刺激蘇聯在中蘇邊境和越南地區增加兵力，製造亞太地區的不安，引起日本和東協國家的疑慮。

但中共方面的看法完全不同，美國雖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使多年來中共對美國的統戰基本上已經達到目標，但是要想根本解決「台灣問題」並非易事。因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忽視，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就更是舉世皆知，台灣社會的進步、繁榮、安定以及快速的經濟發展，強大的國防力量，使得中共領導人決不敢輕視。更重要的是中共自從毛澤東死亡以後，文革派分裂，發展到實踐派與凡是派之間的權力鬥爭；而鄧小平掌權以後，更是引起黨心、民心和軍心的渙散，各地出現信仰、信心和信任的危機，尤其是在經濟上面臨崩潰的邊緣。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共當然不可能以軍事手段來解決「台灣問題」，因而轉而求其次，祇有對中華民國政府進行和平統戰。

唯中共所以採取和平統戰，也是受到國際因素的影響。美國方面雖然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但不希望因此引起台海地區的緊張情勢，給予中共軍事侵犯提供有利的條件。特別是中華民國的存在與台海地區的安定，實為美國對亞洲政策主要的目標之一。美國有些學者主張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政策，應鼓勵此一地區的自由民主國家對抗共黨政權，以自由民主社會的進步與繁榮，逐步誘導貧窮落後的共黨社會實施改革，最後達到改變共黨極權的本質。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克萊恩（Ray Cline）在「亞洲十個資本主義國家與五個共產國家」乙文中就持這一觀念。事實上，美國對亞洲的貿易政策，就是極力扶植亞洲三個新興工業國家：中華民國、韓國、新加坡及香港地區，作為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範例。在這種政策之下，美國決不容許中共對台海地區採取軍事冒險。故雙方在建交談判時，卡特政府國務卿范錫（Cyrus Vance）要求中共放棄「解放台灣」（Liberation of Taiwan）的口號，改為和平解決（peaceful settlement）台灣問題。^⑫此一建議為中共所接受，也顯示美國政策的

方向。

基於主觀的因素和客觀的條件，中共祇有採取和平統戰的策略，暫時放棄軍事的解決方式。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共與美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中共御用的組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並且提出三通（通郵、通商、通航）和四流（學術、體育、文化、科技交流）作為和平統一的先行步驟。同一天，鄧小平在「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舉行的座談會中指出，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把台灣歸向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拉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⑬但他又承認，要達成這項目標，今後仍需有許多事要做。這許多事是指繼續對中華民國統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鄧小平在美國華府訪問時表示：「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說法了。祇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行制度」。

^⑭所謂統戰就是運用一切可以運用的手段，達到打擊敵人的目的。中共動員了所有的力量對中華民國發動和平攻勢，為了配合這項政策，原來禁止活動的所謂「民主黨派」，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和「九三學社」等組織，都再度在統戰部指導之下活動。這些組織最重要的是「台灣自治同盟」。因為它利用這個組織與海外「台獨」份子接觸，以期達到「島內革命」的目標。

至此中共對中華民國的統戰分三方面進行：一、中共直接從事統戰活動；二、運用台獨份子醜化中華民國政府，或在內部從事破壞性的活動；三、對美國從事統戰活動。關於第一點，中共為了加強對中華民國政府統戰活動，自中共最高決策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到各省都設有專門機構，如中央政治局成立「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中共國務院設有「對台辦公室」，政治協商會全國委員會設有「對台宣傳組」。至於地方單位如福建省設有「福建省台灣工作委員會」，這些專設組織的名目繁多，無法一一枚舉，但現在任何組織似乎都有類似對台工作小組的設置。由此可見中共對於台灣統戰重視的程度，等於全面推展。

儘管中共全面動員對台進行統戰，但都一一相繼失敗。如中共提出「

三通」與「四流」受到中華民國政府冷淡的反應以後，一九八一年中共又搞「隆重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並且在同年九月三十日由當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葉劍英提出國共兩黨對等談判九點建議，要與中國國民黨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這九點條件祇是一種欺騙的手段，經我政府拒絕以後，又再度受到挫敗。去年趙紫陽訪問美國時，又再度提及與葉劍英九點和平建議相類似的論調，毫無反應，使中共再次遭到挫敗。

當然中共也考慮到透過「台盟」組織，在台灣內部製造破壞活動，但這些台獨份子的頭頭都是扶不起的阿斗，派系林立，爭權奪利，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根本不發生任何效果。中共領導人檢討之後，對台統戰唯有走國際路線，利用美國拉攏中共的構想，以期進一步達到孤立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這些是中共當前統戰活動的重點，也是主要的目標。

伍

就當前中共與美國的關係而言，自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雙方簽訂三個公報，即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尼克森與周恩來發表上海公報、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建交公報（實際上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提前發表）和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發表聯合公報。這三個公報都是在不同環境之下的產物，現在不論中共或美國政府都一再表示，雙方都遵照三個公報作為關係的基礎，但是美國國會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制訂「台灣關係法」。這項法律是美國與中華民國建立關係的基本準則，唯美國與海峽兩岸建立關係的公報與法律其中有許多矛盾之處，尤其是按照「台灣關係法」規定美國應出售防衛性的武器，這與「八一七公報」不無衝突之處。更重要的是，美國繼續出售防衛性的武器給予中華民國政府，對於中共要「解放台灣」形成嚴重的障礙，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中共不可能以軍事手段來「解放台灣」。也因為這種原因，今年一月趙紫陽訪問美國各地時一再提到雙方之間的主要分歧，或雙方關係的發展主要障礙是台灣問題。今年四月雷根訪問中國大陸之時，中共也再三重申這個問題。

雷根當然知道中共的立場，但是不可能接受中共的條件。雷根一再表

示，為了交新朋友而不忘老朋友。特別是今年雷根訪問中國大陸之前，向中共記者正式表示：「我認為中國領導人對我們的立場是相當清楚的，那就是我們同台灣的中國人民有着悠久歷史性的友誼。我們不打算為了新朋友增進友誼或結交新朋友而背棄老朋友，所有這一切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⑮

從雷根總統這一番話可以瞭解，雷根強調不是法律上的理由，而是感情上的關係，這種關係是相當脆弱的。針對中共的立場，最近中共對美國的統戰政策已經漸漸集中在反擊雷根說的新朋友與老朋友的觀點。中共所採取的政策是，趙紫陽在今年一月三日於人民大會堂向美國和加拿大記者招待會上指出：「朋友與朋友的關係，國家與國家的關係，是兩個性質根本不同的問題」。他又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民同另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民保持友誼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因為這種人民之間的友誼和朋友關係而介入另一個國家的內政，這是不允許，也是不符合國際關係準則的」。^⑯中共統戰組織之一——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在雷根訪問之時，針對雷根對中共駐美記者談話指出：「有些美國人（筆者按——即暗指雷根總統）最近聲明，為了交朋友不拋棄老朋友，我們不知道朋友的意義，如果他所指政府而言，那麼他們是談論兩個中國，不祇是朋友……我們無意要求美國放棄老朋友，也不要把這個嚴肅的政治問題轉變成為對道義方面無盡的爭論」。

以上是中共對雷根言論的反駁，這是消極的作法，祇會引起無謂的爭論，接受與否，完全視雷根個人的認定，但是最近中共對美國總統策略進一步的轉變，一是胡耀邦破例地在中海海接見美國紐約時報資深編輯雷斯頓（James Reston），以盛宴招待暢談中共與美國的友誼，以期利用雷斯頓在美國輿論界的影響力，改變美國對中共的觀感。^⑰六月二十五日趙紫陽也破例在中南海接見美國華盛頓特區「西德威爾友誼中學」（The Sidwell Friends School of Washington, D. C.）的訪問團，並親自帶他們暢遊中南海，從上述三種作法顯示，中共現在的政策明顯地看出，中共不但是美國的老朋友，而且這個朋友其重要性超過在台灣的盟友，基於這種趨勢的發展，今後中共對美國的統戰重點就是作歷史翻案，

集中在宣揚中共是美國的老朋友。

當然中共強調與美國之間的友誼，必然受到雷根政府的歡迎，但美國制訂外交政策是基於國家利益。故中共對美統戰的手法是如何使美國感到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防止朝鮮半島戰爭的再度爆發，希望透過中共抑制北韓的行動。美國對亞洲的另一項目標就是設法運用中共制衡越南在中南半島的擴張，進一步打擊越南的影響力。

基於統戰策略的要求，中共必然在朝鮮半島和越南表現符合美國的利。在雷根結束大陸訪問之後，胡耀邦立即訪問北韓，中共一方面表示支持金日成的對解決朝鮮半島的建議，主張北韓、南韓和美國三方面舉行會議，要求美國撤出韓國；^⑧一方面又支持美國的立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張香山對日本社會黨訪問團表示，中共不支持北韓南侵。^⑨但至六月三十日，胡耀邦又對北韓「對外經濟事業部部長鄭松南」表示，雙方命運相同，「過去我們相互支持，現在我們相互支持，今後還要相互支持和友好下去」。從中共領導人這種反覆無常的態度可知，就是在玩弄兩面的手法。

中共對越南的態度也是如此，中共領導人深知美國希望中共在阻止越南擴張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故在雷根訪問大陸期間，中共製造邊境衝突。就在雷根訪問大陸前幾天，中共製造中越邊境衝突，四月十五日中共砲轟邊境四個省。^⑩由於這次中越邊境衝突是做給雷根總統看，也間接支援施亞努聯合政府，符合美國的立場。

中共對美國玩弄兩面手法，以「玩蘇聯牌」最明顯，今年一月趙紫陽在美國紐約訪問時特別會見反蘇的學者與卡特政府時期的美國官員。但在雷根訪問之前，中共居然邀請蘇聯第一副總理阿克博夫。而中共與蘇聯在雷根訪問的前一天即宣佈，這不是巧合，而是有意的安排。儘管雷根訪問時中共刪減雷根反蘇的言論，但在中共製造中越邊境事件，引起蘇聯方面的不滿，蘇聯遂決定臨時取消這次訪問。但趙紫陽仍然表示中共與蘇聯關係繼續進行正常化的磋商，^⑪令人驚奇的是，最近發行的英文中共「北京週報」則表示雙方關係難以改善。^⑫這種翻雲覆雨的手段，就是處處製造各

種矛盾，給予美國政府的印象，中共的外交政策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筆者無法知道美國政府是否瞭解中共的障眼法，但是最近美國決定出售殺傷性武器給予中共，以及舒茲到亞洲訪問，解釋美國對中共的軍售政策，顯示美國對中共存有一廂情願的想法。

中共這種作法表面上是在討好美國，但是如仔細研究就瞭解中共是在玩弄統戰伎倆，又搞「又聯合又鬥爭」的手法，目前中共強調與美國友好的同時，却又大事宣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是極大的陰謀。因為這五項原則自然與「上海公報」結合在一起，也因為強調這五項原則暴露出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要求廢止「台灣關係法」，為「廢法」製造情勢，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還有一點也是值得我們警惕的，中共運用一切的壓力迫使美國減少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軍售，可以說是黔驢技窮的地步，祇不過是虛偽應付，仍然售予我國高性能武器，最近美國政府性能良好的運輸機引起中共言詞上的反對以後，又製造台海危機以考驗雷根政府的反應。中共如以這種方式來阻止美國的軍售，將使雙方關係受到另一次的重大考驗。

結 論

從目前中共統戰的重點來看，中共仍然以美國為主，唯重點是集中在加強與美國人民的友誼，對亞洲作象徵的姿態，表現符合美國的利益。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共到處宣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國際間製造形勢，暗指美國違反此一原則，干涉「中國」內政；同時還在台海地區製造危機，以間接的方式阻止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軍售，這種情勢使中共與美國關係進入另一項考驗，這是當前的重大問題，我們必須密切注意，妥擬對策，以反擊中共的國際統戰。

註 釋

①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幼稚病」，列寧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卷四，頁三三八。

② Foster R. Dulle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 China, The Historical Record : 1949-1969 (New York : Thomas Y. Crowell Co. 1972), pp. 155-165.
- ③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altzgra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 Comprehensive Survey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81), pp. 61-69.
- ④ George F. Kennan,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6), pp. 65-67.
- ⑤ Ibid.
- ⑥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 Chapter 18, 19, 20.
- ⑦ 「聯合公報」, 人民日報,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 ⑧ 同上,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
- ⑨ 同上,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 ⑩ 同上,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
- ⑪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New York :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p. 196.
- ⑫ Cyrum Vance : Hard Choices, 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Affairs Policy (New York : Simon and Scgunster, 1983), pp. 81-82.
- ⑬ 人民日報,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
- ⑭ 文匯報, 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 ⑮ 同上,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
- ⑯ 人民日報, 一九八四年一月四日。
- ⑰ 大公報,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 ⑱ 人民日報, 一九八四年五月七日。
- ⑲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26, 1984.
- ⑳ Ibid., April 16, 1984.
- ㉑ China Daily, May 20, 1984.
- ㉒ Beijing Review, July, 9, 1984.

病裏逃生——一個病例的解剖

卡森斯 著
錚錚 譯
定價四五元

原書在美國為八十年代「非小說類」最暢銷書。作者在書中坦誠談及他親身以「大笑法」、「高量維他命」、「強烈想要活下去的意念」等方式將不治之症醫好, 作者親身的經歷在大英醫學雜誌發表後, 引起美國及世界各地醫學界極大震盪, 大大影響了醫生與病人之間關係及醫生處理病人之態度。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